

周珍 方华 译

邱吉尔 及其密友

〔英〕约翰·科尔维尔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邱吉尔及其密友

〔英〕约翰·科尔维尔 著
周 珍 方 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邱吉尔及其密友

[英]约翰·科尔维尔 著
周珍方华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75,000字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500册

统一书号：11203.049 定价：1.50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约翰·科尔维尔曾任邱吉尔的私人秘书多年，是邱吉尔的亲信。他在本书中对邱吉尔的家庭成员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着重叙述了邱吉尔的一些密友的情况及其与邱吉尔的关系。这些密友不仅包括他的同事、顾问和高级将领，还有象罗斯福和戴高乐等外国人。作者还用一章专门叙述了邱吉尔与一些女人的关系。作者除生动地描绘了邱吉尔的性格外，还写了他的许多轶事和趣闻，这对了解邱吉尔其人，颇有参考价值。

前 言

温斯顿·邱吉尔在卸任首相以前的几个月对我说：“有朝一日，你一定要写出我们一起看到的所有这些事情。”其他许多人已经写了、并将继续写这些“事情”，他们写的准确程度不同，所作的解释也不同。在邱吉尔是主要演员的那个舞台上，角色很多，我目前作的努力是为其他演员画像。有些演员我很了解，有些只是认识而已，有些与邱吉尔的关系对我来说则是古老的历史，对于这些人，我是根据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对他们的看法以及根据邱吉尔夫妇对他们的描述来写的。我已尽了最大力量来叙述我所见到的全部真实情况，既指出好的方面，也指出不足之处，但我设法把批评与恶意区别开来，这个目标，邱吉尔在天之灵是会赞许的。我从已发表的材料来源中引用的事实不多，因此没有提供参考书目。本书的内容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仍然清晰的记忆写成的，然而，记忆难免有错，所以更多地是根据我在为邱吉尔效劳

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记的详细日记写成的。

在写邱吉尔周围的人们时，我自然要经常提到他本人，提到他对重大事件和政策的看法。但是我并没有想要孤立地描写他。（几年前，我在为《今天的行动：与邱吉尔一起工作》一书写稿时这样做过。）

我应热诚感谢约瑟芬·巴特勒小姐和艾琳·奥尔德夫人，她们任劳任怨地把我手写的书稿打出来。我的可爱的家属在我写书时总是制造最大程度的干扰，可是这次却没有象通常那样使我分散精力。

目 录

前 言		
第 一 章	早期的朋友	[1]
第 二 章	家庭	[23]
第 三 章	教授和布伦丹	[40]
第 四 章	私人办公室	[68]
第 五 章	比弗布鲁克	[85]
第 六 章	美国人	[110]
第 七 章	妇女	[142]
第 八 章	顾问	[161]
第 九 章	军人	[178]
第 十 章	安东尼·艾登	[208]
第 十 一 章	同事	[223]
第 十 二 章	莫兰勋爵	[246]
第 十 三 章	戴高乐	[253]
第 十 四 章	道路的尽头	[273]

第一章

早期的朋友

温斯顿·邱吉尔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成为联合王国的首相时，年过六十五岁，已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了。他的充沛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依然不减当年，但是他的许多同胞，不管其政见如何，都认为他声名狼藉，而不是大名鼎鼎，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好感大于对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好感。在他二十五年的余生中，他却誉满全球，并得到世人的尊重和爱戴。

本书主要叙述他最后二十五年中的同事和朋友们的情况。但是他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当选进入议会的，在后来的四十年中一直锋芒毕露。他担任过许许多多不同的艰巨职务，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英国海军大臣在内。最后，在一九三九年，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十一年之后，

由于他大声警告人们提防即将来临的危险，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充满惶恐和凶兆的大陆上爆发时，他再次出任英国海军大臣。

在他就任首相之前的四十年中，有许多人是支持他的，然而反对他的人更多。本章要叙述一些支持邱吉尔的人的情况。邱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结交的朋友中，只有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在他身边。此人就是马克斯·艾特肯，即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和邱吉尔的关系很深，值得单独用一章来叙述。

在青年时代，有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是邱吉尔所尊重的。哈罗公学校长韦尔登博士对于一个显然是不可救药的男孩子费了不少心思。邱吉尔请他在自己的婚礼上致词，这一点证明邱吉尔对他有好感。邱吉尔还尊重宾登·布拉德爵士，他曾在这位爵士的指挥下在印度的西北边境作战。他对美国众议员伯克·科克兰的忠告和哲理有深刻印象。他喜欢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后者是在布尔战争^①中同他交上朋友的。他母亲的几个朋友也受到他的注意。但是，总的说来，邱吉尔在进入下院和进入二十世纪时，熟人是很多的，但他的朋友比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通常应有的朋友要少，支持邱吉尔的人是难得碰到的，而且除了他的亲属之外，没有一个在三十岁以下。

^① 英国于一八九九年对南非布尔人进行的战争，布尔人战败，一九〇二年媾和。——译者

一些人是靠耐心、勤奋和毫无怨言地长期往上爬而发迹的。另外一些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是靠出风头而飞黄腾达的。他们无论如何要让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使自己成为尽可能广泛的人们议论的话题，即使是遭到批评也好。毫无疑问，这主要是一个性情问题，而不是故意要这样，因为有些人终生急于前进，而另外一些人则满足于向一个选定的目标慢慢地前进，牢牢地保住一个职位以后，再朝着下一个职位前进。

温斯顿·邱吉尔是一个急性子的年轻人，喜欢受到宣扬，不怕人反对。他雄心勃勃，但是他真心诚意地渴望为国效劳，并坚信他所拥护的事业。他准备冒葬送政治前途的风险，而不愿放弃他发誓要达到的目的。他工作勤奋，但他肯定是爱出风头的。

当他被选入议会时，他甚至不认识他在下院中的许多同时代人，他父母的朋友认为他的情况很有趣：跟他同年的人认为他鲁莽轻率，咄咄逼人，狂妄自大。但是，谁都认为他精力充沛，热情洋溢，谁都承认他文笔流畅，口才流利。他早年写过《马拉坎德野战军》和《河战》^①，因而拥有广大读者。他在比勒陀利亚从布尔人手中逃跑以及在恩图曼随第二十一骑兵团冲锋陷阵的事，在世界各国的报纸上得到宣扬。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他的名字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在那个

^① 此两书分别于一八九八年和一八九九年出版，前者叙述在印度的战事，后者叙述在埃及尼罗河的战事。——译者

时代，从写着“拉”字的门走进去，要比从写着“推”字的门走进去容易些，虽然总有一些人从写着“推”字的门走进去了。邱吉尔则利用了这两种门。

我认为，值得称赞的是，尽管有许多人不喜欢青年时代的邱吉尔，大概对他也冷落怠慢、百般阻挠过，但是他后来从来没有说过批评他的人们坏话。他忘不了人们对他的好意和给他的机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似乎把那种不愉快的事情完全从他的记忆中抹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谁都不恨，就恨希特勒，那是一种职业上的仇恨。”

一九〇〇年，保守党人掌权。索尔兹伯里勋爵即将把他的首相职位让给他的侄子阿瑟·贝尔福，邱吉尔对贝尔福的彬彬有礼、沉着冷静和聪明才智称赞不已。后来他开始意识到贝尔福不喜欢采取果断的行动，因而曾指责贝尔福喜欢当官而不喜欢原则。但是他承认贝尔福的智力和政治技巧。

在政府的后座议席上，有四个年轻的保守党人一心要使一个看来缺乏魄力和决心的政府具有生气。邱吉尔的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说把他自己的政府的国防政策驳得体无完肤，从而赢得了这些年轻人的赞同。他总是受到他父亲的榜样的影响，他记得，伦道夫勋爵自己领导过一个小小的四人集团（托利党^①民主分子），对索尔兹伯里和强大的塞西尔家族造反。所以邱吉尔同他的四个牢骚满腹的同时代人联合起来了。

^① 保守党昔日的名称。——译者

他们被称为“胡里根”^①或者更经常地被称为“休里根”，这是从他们的领导人的名字演变来的。说也奇怪，他们的领导人就是休·塞西尔勋爵，是索尔兹伯里的几个较年轻的儿子之一。

作为一个压力集团，他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他们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宴会上，他们常常招待重要的自由党人，而不是他们本党党员。他们极其崇拜前自由党首相罗斯伯里勋爵，这位勋爵已离开激烈的党派斗争的战场，但是仍然是国内一个不可轻侮的人物。他在白金汉郡曼特穆尔的宅邸，他在伦敦伯克利广场的住宅，他在苏格兰的达尔米尼的城堡，都向邱吉尔等人开放，因为罗斯伯里被他们年轻的热情所吸引，他们的感情更接近于自由党帝国主义者阿斯奎斯、克鲁、格雷、霍尔丹以及罗斯伯里本人，而不是更接近于他们自己的党。另一方面，他们远离激进的自由党人，包括戴维·劳合·乔治在内，因为这些人反对进行布尔战争。

除邱吉尔出身贵族外，四个“休里根”也都是名门出身：休勋爵；阿瑟·斯坦利，大财阀德比勋爵之子；伊恩·马尔科姆，他娶了莉莉·兰特里与巴顿伯格的路易斯亲王所生的女儿；珀西勋爵，诺森伯兰公爵之长子。斯坦利和马尔科姆后来干了许多好事，但始终没有获得政治声誉。邱吉尔认为颇有出息的珀西在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担任过副大臣的职务，但是不久在巴黎一家二流旅馆里神秘地、孤零零地死去了。这就只剩下了休勋爵。

^① 意思是流氓。——译者

休勋爵除了坚信自由，坚信英国宪法的优点以外，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不象邱吉尔。他是一个虔诚的英国圣公会教徒，他的原则严肃，习惯适度，兴趣广泛，他还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然而，两人相互吸引，邱吉尔把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给休勋爵，而他对别人是难得这样做的。他有一次写道：“当自由贸易问题平息下去时，我个人的雄心完全暴露出来了，这种雄心本身是一种丑恶的、令人不满的景象，但由伟大事业的潮流推向前进时，则完全是一种优点。”他在一九〇四年写的另一封信中说：“只有你对我的思想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因此，四年后，他要求当时在下院中坐在他对面的休勋爵当他的婚礼的男傣相。休勋爵答应了，并写了一封具有特点的回信，解释了在婚礼上当男傣相的含意。

休·塞西尔勋爵从来没有担任过较高的职务，他在后来的四十年中主要是以他的聪明才智为教会效劳，而不是为国家效劳；但是他在下院一直呆到一九三六年，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个代表，一个严格的行为审查者，并且始终是邱吉尔所喜爱的人物。到一九四一年，他成为伊顿公学的校长，尽管他很不喜欢那里的学生，并认为大多数学生是毫无吸引力的。幸运的是，校长并无义务要密切关注他们。邱吉尔写信给他，表示愿意向他提供上院的一个席位，“以击退阿道夫·希特勒的进攻，保持贵族的精神，在主教们犯错误时责备他们。既然伊顿的校舍已被敌人的行动所毁，你可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和力量了。无论如何，我希望在议会中再次看到一位‘休里根’兄弟”。自从一九〇四年以来，情况已大变。但是那个

时代的一个朋友仍在，这个朋友对邱吉尔仍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邱吉尔以外，“休里根”都销声匿迹了，他们没有对政治历史作出贡献。他们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是邱吉尔在议会中最早的同事，也许还是他所结交的他们那一代人中最早的朋友，邱吉尔在哈罗公学和桑赫斯特军事学院的同学都觉得跟他合不来，在更广泛的圈子里，有人对他敬而远之，因为他态度傲慢，看不起那些无助于实现他的雄心的人。正如他向休·塞西尔勋爵所承认的，这种雄心本身是“一种丑恶的、令人不满的景象”。此外，他很容易发脾气，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显然是无法控制的坏脾气。

在“休里根”中，只有邱吉尔在议会中脱离保守党而成为自由党人。他这样做正合时宜，从自由党在一九〇五年的政治大胜利中获得了好处。他立即被任命担任殖民部政务次官的职务，这主要是通过推而不是拉的办法，也是因为他具有得到证明的能力。当新议会于一九〇六年开会时，坐在反对党席位上的只有少数几个陌生人，因为保守党的一百三十人的轻松自在的多数已变成了自由党的占压倒优势的三百五十多人的多数。

但是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新人，即利物浦的沃尔顿选区一位保守党议员。不久，他同邱吉尔的关系就比自由党方面的任何人都更加亲密。他是一位律师，他作为律师的出色表现，他的特殊的智力，他对语言的精通，他在法庭上既能反唇相讥又能进行猛烈攻击的雄辩才能，使法律界大为震惊。他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孙子，他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埃德温·

史密斯，大家都叫他弗·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了掌玺官和伯肯黑德伯爵。象邱吉尔一样，他总想故意讲些令人听了不舒服的话。事实上，他的嘴比邱吉尔厉害。他能够回敬别人，据邱吉尔写道，这种回敬“会使人们的嘲笑转向攻击他的人”。因此，他们都招来更多的诋毁者，而不是更多的钦佩者，至少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中是这样。

到一九〇七年三月，他们两人是如此相互尊重，以致已在牛津大学赢得学术桂冠的弗·埃把邱吉尔带到牛津大学，参加俱乐部的辩论。在这种辩论中，双方是要持敌对态度的，他们在辩论中彼此攻击。几个月后，邱吉尔也礼尚往来，把他在反对党后座的这位朋友带去参观法国军队的演习。后来，他成为内政大臣时，又同弗·埃一起访问了君士坦丁堡。他们两人一道在牛津郡轻骑兵团里任军官，他们一道进餐，一道赌钱，两人在一起使他们颇为愉快。

他们的政治观点通常处于两个极端，因为邱吉尔是一个坚定的自由贸易者，而弗·埃则是一个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是私下里他们却难分难舍。除了赌钱、饮酒和舌战以外，邱吉尔日益受到弗·埃的智慧的影响。在弗·埃死后，他写道，他始终认为，“无论是在公开的争吵或私下的困窘局面中，弗·埃的意见都是十分宝贵的”。弗·埃认识了新近到达的加拿大名流马克斯·艾特肯后，就把艾特肯介绍给邱吉尔。邱吉尔同他的内阁同僚劳合·乔治关系密切，他又把劳合·乔治和弗·埃拉到一起。

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英国的党派斗争

空前激化。在上院否决了劳合·乔治的激进的预算法案，自由党政府不顾北爱尔兰的强烈反对企图让爱尔兰实行自治之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悠久的、几乎是自然的良好个人感情消失了。政府决心削弱上院的权力，向议会提出了一项限制上院权力的法案。在伦敦的社交界，托利党的大房子是禁止自由党人进入的，不管他们的名声多么显赫，出身多么高贵，而保守党人则不愿跨过唐宁街十号、克鲁府第或卡林顿勋爵在王子门街的好客的自由党之家的门槛。

温斯顿和弗·埃之间的关系并未受到这种深仇大恨的影响。然而，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邱吉尔对我说，有一次，他蒙受了他终生难忘的耻辱。他同弗·埃一道乘车经过哈罗公学附近。他要司机把他们送到学校里去。他想让弗·埃看看他过去上学的学府（至少是改建后的学府）。在邱吉尔进入该学府之前两年，弗·埃未能赢得哈罗奖学金。学生们正在“比尔院子”集合进行每天一次的点名。他们认出了邱吉尔，于是异口同声地向这个著名的支持议会法案和爱尔兰自治的人发出嘘声。他转身而去，在他的朋友面前丢了脸，并发誓决不再回哈罗。虽然他在后来的几年里多次违背自己的誓言，但是他的确让他的儿子伦道夫进了伊顿公学。

从一九一一年起，邱吉尔的一大乐事就是同弗·埃、马克斯·艾肯特，有时同劳合·乔治一道进餐。他打电话给家里说，他要把他们全都带到家里吃饭，最好能准备些大虾和烤鸭。在家庭预算比较紧的情况下过日子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他是根本不理解的。他的妻子克莱门坦愿尽力而为，因为她

既不愿危害她丈夫的政治生涯，也不愿怠慢他的朋友。但是她讨厌他们在她自己家里或者在别的某个人家里举行夜宴，因为这总是要吵吵嚷嚷，畅饮白兰地，闹到深更半夜。有一个人同情她，这就是象她一样受罪的弗·埃的妻子玛格丽特·史密斯。但是她们两人都太爱自己的丈夫了，所以只是规劝而已。但是她们的规劝并不是很有力的，因为邱吉尔和弗·埃都繁忙紧张地工作，她们认为没有理由剥夺他们所欣赏的那种乐趣。

他们认为这种形式的社交活动是愉快的，在政治上使人具有活力，因为进行争论和交换有见识的看法能增进才智。邱吉尔和艾特肯两人身强力壮，他们可以喝大量的烈性酒而面不变色。弗·埃则不那么幸运。也许他喝得较多，或者易头晕而显出醉态，他落下了酗酒过度的名声。虽然看来这并未影响他在法庭上或在议会里的表现，但他确实一度觉得他应当只喝些苹果酒，这是一条自我克制的法令，它使邱吉尔感到非常恐怖。

在整个战争期间，弗·埃在邱吉尔处于逆境时一直坚定地支持他，正如邱吉尔在顺境中一直支持弗·埃一样。邱吉尔违反保守党领导人贝尔福的意愿，劝阿斯奎斯使弗·埃在国王乔治五世加冕典礼的授勋名单上成为枢密顾问官。五年后，英军在加利波利遭到惨败后^①，邱吉尔在公众谴责和个人

^① 加利波利是土耳其的一个港口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在那里遭到失败。——译者